

人文主义的力量

现代人在面对技术统治和工业化的世界时，常感到无能为力
如何唤起人的内在冲力，使生活变得有朝气，充满希望
这需要一股巨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即来自于人文主义的复活

韦政通 著

人文主义的力量

韦政通 著
何卓恩 王立新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主义的力量/韦政通著;何卓恩,王立新编. - 北京:

中华书局,2011.1

(韦政通文集)

ISBN 978 - 7 - 101 - 07466 - 6

I . 人… II . ①韦… ②何… ③王… III . 人道主义 -

中国 - 文集 IV .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747 号

书 名 人文主义的力量

著 者 韦政通

编 者 何卓恩 王立新

丛书名 韦政通文集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15 1/4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466 - 6

定 价 28.00 元

不熄的理想火焰

——写在“韦政通文集”出版之际

歌德曾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智者在交谈”。陈列在你面前的这部文集，就是当代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以毕生心力和热情，曲折探索和思考的结晶之一，是一部娓娓道来的传统与现代相交响、作者与读者相共鸣的好书。

自从西风东渐以来，社会转型的历史课题即在中国出现。围绕是否需要转型，采取何种路径转型，向哪个方向转型等亟需解决的大问题，相继出现几个思想高峰。一是维新时代的“新旧”之思（围绕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而展开的思考与争论），一是革命时代的“主义”之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取舍），一是战后和平年代的“现代化”之思（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个人、社会、国家价值的均衡）。韦政通先生的思想，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来展开的。

先生致思的时代，变革已成为共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不再能激起社会的涟漪；“主义”之争由于半个世纪理与势的竞争也已渐成定局，有略显过时之虞；而在战后和平发展的时机下，如何为海峡两岸的中国缔造一个光明的前途，遂成为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大陆思想界，开始全面讨论现代化的道路，而在此之前约二十年，随着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现代化已经成为讨论热点。韦政通先生便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者之一。韦先生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最主要的兴趣点是在传统思想的

现代转化方面。

韦政通先生作为思想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异数，他的学术思想道路充满坎坷和艰险。

先生出身苏南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时如果按照父亲的愿望，继承家业，依其天资，假以适当环境，或许会成为一个地方上较有实力和影响的企业家。但他不喜欢从商，竟违逆父亲的意愿，只身外出求学镇江、南京、上海，屡经周折，也没有读成一个完整的学历，而后又鬼使神差地跑到台湾去了。完全出乎意料，早期在台湾无依无傍的生活，竟然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少在各自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学者和思想人物，千载难逢地齐聚台岛一隅，为他的学术生命提供了珍贵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劳思光、方东美、陈康、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等学人先后成为他学术生命的浇灌者，一个依靠自学的青年，有此幸运，真可谓生命中的奇遇。

先生在台湾大学旁听方东美先生的“人生哲学”、“印度哲学”课，陈康先生的“希腊哲学史”课，每两周参加一次牟宗三先生在台湾师范学院的“人文友会”，有时因缺车资，必须从火车站步行到台大和师院。“友会”是夜间举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其间生活多次陷入绝境，有时仅赖院中木瓜充饥。依靠王船山精神的激励和陆王学说的提撕，先生度过了早期的艰困岁月。

先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在历经数年跟随牟宗三先生的“信仰之旅”之后，越来越感觉到不满足，遂将自己置于超越师门情感，独自探险的挑战途中。就在此时，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出现在先生的生活世界里。与殷海光先生的交往颇不同于和牟宗三先生的交往，“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认识他（应该说是崇敬他），不认识自己；在殷先生那里，我认识了我自己”（王赞源《韦政通教授访问录》）。

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先生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做一个学者，是我年轻时的愿望，其他两种角色，绝非当年所敢想象，而是由于不寻常的学思历程，和一些意外的人生机遇塑造而

成。”先生的著述，按照这三种角色，可分为学术、思想和社会关怀三部分。具体说，学术部分，专题研究包括“荀子研究”、“朱熹研究”、“董仲舒研究”、“孔子研究”、“毛泽东研究”等，通史撰述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体现学术通俗化的著作包括《中国文化概论》、《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的智慧》等；思想部分，儒家思想批判著作包括《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儒家与现代中国》、“儒家在台湾经验中的角色”的系列文章等，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探索著作包括“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系列论文、《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等，现代伦理道德问题探索著作包括《伦理思想的突破》、“当代伦理诊断与重建”系列论文；社会关怀部分，包括有关知识分子、台湾政治与文化、中国未来的系列论文。“著述等身”，也许可以用来描述先生勤奋笔耕的量，却实在不足以概括先生蔚为大观的学术思想成就和宏博气象，不足以体现他贡献给时人和后世的活生生的智慧。

先生以学术为生命，他的治学，最重客观的精神。先生所献身的学问，是面对活生生的时代问题的学问，他总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历史，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固步自封。

先生以开放的心态，意识到“中国缺乏独立的学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和这个根本缺陷（逻辑、知识论不发达）是密不可分的。这个缺陷不但长期延误了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先生此种说法，一方面点出了我国知识分子仍然难于摆脱的自封心态，同时也可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将儒家当成学问的努力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再度提示。

客观的精神导引开放的心态，开放的心态推助客观的精神。先生借助对近代中国不幸遭遇的客观了解，进而再度达成了对近代史上的—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切“同情”。“鸦片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和中国国力的日益衰微，在这种内外交逼的情况下，使用任何外交策略，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在这期间，我们抵御外侮的条件各

方面都非常薄弱，唯一突出的现象，是出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人才稍早有林则徐，然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曾纪泽，他们凭着极有限而又模糊的国际知识，在对交往对手的强度、意向缺乏资讯作为判断依据的情况下，依然要折冲樽俎于列强之间，可谓备极艰辛。”“所谓‘弱国无外交’”，“鸦片战争后，在外交上接受残酷考验的不只是少数人才，而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以当时文化衰落、社会解体、民心涣散的中国，面对强劲无比的西方列强，“不管使用任何外交政策”，都同样避免不了一败涂地的结局（《19世纪中国与西方》）。

古往今来，真正的大学问，总是离不开历史的责任和对现实的关怀，这一点在先生的所有文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先生提倡为知识而知识，不是为了让大家脱离生活实际，只是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独立不屈之品格，意在争取知识本身独立不倚之地位，意在追求热爱真理的新知识传统，而并不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对社会、对民族和对人类的责任。先生研习古代思想文化，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安宁的栖息场所，从而高枕无忧地安睡其中，往而不返。先生不喜空谈玄理，一言一说必求中的，中历史文化之的，中社会生活之的，中人心风俗之的，中国家民族之的，中人类命运之的。其为现代社会和人生立言的目的性随处流溢。

先生将自己的这种责任情怀称作“现实的关怀”，先生对现实的关怀是多角度、多方面的，诸如政治、伦理、教育甚至环境等问题，无不在先生的视野之内，关怀之中。这种关怀充分展现了先生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挚之爱。

除了在学术、思想上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之外，先生还以永不停息的追求、坚持不懈的努力，鼓荡理想，燃烧激情，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不断重新铸造自己，使自己的精神生命不断升级，不断放射出令人艳羡的耀目光辉。也许这才是先生最有感染力和诱惑力的成功。人的一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其所获得的成就，归根到底都是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生命的成功。这种成功无不在价值原则的导引下进行，无时无刻不受理想光辉的指引。点燃起理想

的火焰,让它永不熄灭,并按照它的指引前行,生命的潜能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生命的意义就能在最大的限度内展现。先生的成功,就是理想实现的典范,先生就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理想之火焰。

先生的著作,二十多年前开始在大陆出版。这些著作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不少读者意犹未尽,在不清楚联系地址的情况下仍然辗转去信求购先生的其他著作,甚至产生浓厚的研究热情。日益增加的阅读需要,使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上述著作已经显得难以满足。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先生的全集目前尚不具备出版条件的情形下,我们认为在先生的全部文字中精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一套较能反映先生思想各个面向的多卷本文集,也许是一个可解一时之急的办法。我们向先生请示,征得同意,终于有了这套文集的出版。

这部“韦政通文集”,基本的选编思路,是希望在尽量体现先生著作结构的同时,能够照顾到大陆读者希望了解先生的实际需要,所以在选材上,采取“论学”、“论世”、“评人”、“自述”的思路分卷。

《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学”部分,列两个专题:一是“儒学新探与方法革新”,收录先生研究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的几篇文章以及若干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力图反映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和风格,使读者了解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二是“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收录先生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思想创造作品,包括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思想和对新伦理问题的思考。

《人文主义的力量》为“论世”部分,列三个专题:“巨变与传统”专题主要体现先生对时代变迁的体认;“知识分子的责任”专题意图体现先生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呼唤;“迈出五四的幽灵”专题希望呈现先生对知识分子努力方向的理解。

《时代人物各风流》为“论人”部分,重点突出对人格问题的关注。列传统人物“古典人格的光辉”、近代人物“危机时代的探路者”、当代人物“坚毅的魅力”三专题。本着薄古厚今的原则,传统人物只选取了四篇,近代人物收六篇,当代人物收九篇。

《知识人生三大调》为“自述”部分，除了收录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同时收录几篇补充性的文章。为显示伦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虑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拟收入“论学”之卷的几篇关于伦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讲，也作为“我的伦理思想”收录到了这里。本卷最后，附录了一篇概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先生还有许多精彩文字一时尚无法纳入这套文集，这是编者的遗憾，也是编者需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的。

编者

2008年5月

目 录

巨变与传统

- 巨变与传统 / 3
- 启蒙运动与当代中国思想发展 / 19
- 孔子成德之学及其前景 / 24
- 当代新儒家的心态 / 45
- 儒家伦理在“台湾经验”中的角色 / 60

知识分子的责任

- 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 / 81
- 批判的心灵・社会的关怀 / 95
- 两种心态,一个目标 / 104
- 认知心态与民主心态 / 131
- 学习典范:让理想主义的精神昂扬 / 139

迈出五四的幽灵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 / 145

时代危机与中国哲学 / 150

人文主义的力量 / 162

古典的重要 / 174

仁的哲学的时代意义 / 176

从“疏离”问题看中国哲人的智慧 / 196

五四今日的意义 / 212

迈出五四的幽灵 / 214

人文教育与人的品质 / 216

伦理、民主、科学的三结合 / 233

巨变与传统

巨变与传统^①

一 传统的意义

由于过去的六十年来，中国曾经历过一个长期反传统的潮流，其间又激起一个反“反传统”的思潮，前者不免把传统丑化，后者则反其道而行，又不免把传统神圣化。传统经由这两种情绪化的染色之后，所引起的反应是两个极端，不是拒绝，就是拥抱，使传统早已面目全非，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传统是什么？

(1)传统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特色，构成的基要条件，一在时间的绵延性，一在空间的广被性。短暂的时间里，绝不能形成一个传统，一个民族对传统感觉的深浅，和它历史的长短成正比。就空间方面而言，一些散见的、地方性的、在历史上仅占次要地位的文化元素，只足以构成小传统的要件。通常所说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大抵是指大传统，它是行为的方式和标准，能凭借之加强一个民族的意识和团结。

(2)传统是不是价值中立？如果说，乃是得之语义学的抽离。文明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必然生长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人在生活的许多

① 编注：本文选自韦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第四章。

方面，都须受传统的约制，不得任意而行。但个人与传统的关系，不限于这一种自然的关系，它还可以产出再生的关系，即个人可以透过心智活动超越传统，对传统重新予以认知和选择，或对传统文化的要件做轻重取舍，这时候我们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的活动。自然的关系，是传统赖以稳定的主要因素，再生的关系，则能使传统更新，以适应代代不同的处境。

(3) 凡是能被称为传统的，都已是历史的过去。但在人类社会，过去的并不真正过去，其中许多要件依然还是我们生活中的力量。如果能理智而有效地运用这股力量，则传统成为进步的工具；反之，则传统成为进步的障碍。如果我们传递传统的方式是属于传统的，那么，传统的稳定性高，但易趋于僵化；如果我们传递传统的方式不再是属于传统的，那么，传统将逐渐变质，其中有些要件也会缓慢地消失。

传统主义代表一种态度、一种心态，主要的目的是在护卫传统中有关行为价值的要件，并企图使它神圣化，对它建立起坚定的信仰。传统主义不重视对事实的认知，一旦事实的认知妨害到神圣化、权威化的时候，它宁可忽视事实以曲从，再加上它的独断性和教条性，使它所表现的精神与宗教极为近似。

由于传统主义对传统有高度的选择性，所以在强调一部分的同时，也就贬抑了另一部分。被强调的部分，他们视之为正统，被贬抑的部分，有时径视为异端，有时则被安排在较低的价值层次上。他们对传统或对世界的了解，完全笼罩在价值意识之下，所以任何意义的“价值中立”之说，在他们都是无法想象，也无法接受。

传统主义不同于国粹主义，也与一般所谓的保守派不一样。国粹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心灵僵化的表现，只能保持一个极为简陋的形式。而一般所谓的保守派是缺乏理想的。传统主义则不然，他们不但有理想，且富使命感，对新知识、新观念能做选择性的接受，不过这些都是为了服务预定的目的，不会因新观念和新事实的刺激，而修正或放弃原有的信念。

根据以上对传统所了解的意义，传统本身并不告诉也不要求我们对它应抱什么态度，当人们对传统产生态度问题时，多半是因传统与新处境之间发生了失调的现象。不同态度的争论，不但影响对传统的了解，甚至影响到它的命运，百年来巨变中的中国，就正严重地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传统主义所代表的态度，是几种主要的态度之一。此外，依据一般的分类，还有与传统主义针锋相对的西化主义，和调和于二者之间的折衷主义。使这个问题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遭遇过的情势，这种情势要把一个古老、孤立而又建基于农业基础上的大帝国，一下子拉到国际社会中去，因此产生极严重的适应上的难题。据经济学家肯尼斯·包定（Kenneth E. Boulding）的观察和分析，人类对巨变的态度，可分为：

- (1)从拒绝到怀恨地接受；
- (2)狂热地、无批评地接受；
- (3)谨慎地、批评地接受。

任何一个社会，对外来的新事物，一开始总不免予以拒绝，这是相当一致的态度。但拒绝不成，以后的反应，就不会再一样了，包氏所说的第一种态度，与现代中国史上出现的传统主义与折衷主义所经历的有些相似，第二种态度则完全和我们的西化主义相合。至于第三种态度，是我们认为比较健全的，在以往的长时期里，这种态度纵然有，也是零星的，缺乏影响力的，直到最近，才有了真正的发展，不久的将来，终必成为主要的趋势，并取代前两种态度。

前两种态度与传统的关系，表面上看，一是拥抱传统，一是拒绝传统。深一层观察，其间的关係，并不如想像中的单纯，尤其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深具黏合力的传统的国家如中国者，面对传统，在迎拒之间，并不是你想如何就能如何的。同样的，你想拥有它并和它建立起再生的关系，也并不如主观意愿所希望的那样容易，其间实隐藏着许多问题，我们如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认识，就很难真正了解它们的缺点，并进一步去改正它。

二 西化主义

西化主义、传统主义、折衷主义，目前似乎已成为对现代中国思想常用的分类法，但所指的内容并不很确定，像倡导“中体西用”说甚力的张之洞，有人视之为传统主义，也有人认为他是折衷派，但相对于清季的顽固派，他似乎又是西化派。又如严复、梁启超，因前后思想有转变，无论你称之为何派，都难以概括他们的一生。所以派别、主义的方法，对某些人虽能与事实相符，对另一些人就只有部分的真实性，但对讨论问题的人来说，就思想的某些特性及其主要倾向加以分类，却又是不能缺少的。

我这里讨论的西化主义，主要是指新文化运动时代的陈独秀、胡适，以及于1930年初提倡“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在陈、胡等人的言论尚未风行之前，自由、民主、科学等新思想在清末早有人提倡，对传统旧文化不满的言论也时有所闻。那时候，仍在满清统治之下，政治体制未改，新文化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到了1916至1917年间，全国接受新教育的人数直线上升，民初政局的混乱，已引起社会广大的不安，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终于利用反对袁世凯的有利情势，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新青年》的思想，与清末主张新思想者最大的不同，是态度上走向极端，企图把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一刀劈成两半，只取其新而舍其旧，对西方文化主张全盘接受，对固有文化则予以全盘否定。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①因此他认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②

这种偏激言论的产生，大部分的原因是受制于当时的特殊情境，一

①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②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第3卷第1号。